文学因何而伟大

论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

李建军 著

直面问题，坦陈己见，一针见血

大师为什么伟大和不朽

为我们时代的文学寻求经验支持

華夏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百家争鸣书系

贺雄飞 主编

李建军 著

文学因何而伟大

论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因何而伟大 / 李建军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80-5541-1

Ⅰ.文… Ⅱ.①李… Ⅲ.①文学评论－俄罗斯－近代
Ⅳ.①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792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装订
720×1030　1/16开本　21.5印张　333千字
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文学的缘故（自序）

凡事都有个缘故的。这是宝玉的一句名言。他说得不错。只是，有的事情简单明白，其缘故自然人人皆知，无须细说，有的事情却扑朔迷离，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要将其缘故说明白，并不容易。

然而，即令如此，人们却还是要追本溯源，非得把问题弄清楚才肯罢休。所以者何？因为，很多时候，只有知晓缘故，人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否则，就会像宝玉对黛玉说的那样："就便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生，还得你申明了缘故，我才得托生呢！"

其实，文学也是有个缘故的。文学不是无所用心的胡闹，不是流情荡志的狂欢，而是一种追求意义的自觉的文化行为。它致力于提高人类心灵生活的境界，使之具有高尚和诗意的性质。将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自然人"，升华为通人情、有教养的"文化人"，这既是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也是文学事业的最终目的：作家之所以写作，是为了这个目的；读者之所以阅读，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或许，正是因为发现了文学的这个伟大目的，正是因为认识到了文学之所以重要和伟大的"缘故"，歌德才在《歌德谈话录》中反复强调作家的责任和文学的作用。他批评史雷格尔"毫不操心去探索一部剧本的作者替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高尚心灵所应有的美好生活和高度文化教养"；他以高乃依为例说明作家承担着培养"民族灵魂"的使命："一个伟大的戏剧体诗人如果同时具有创造才能和内在的强烈而高尚的情感，并把它渗透到他的全部作品里，就可以使他的剧本所表现的灵魂变成了民族的灵魂。我相信这是值得辛苦经营的事业。高乃依就起了能培育英雄品格的影响。"

在歌德看来，只有描写"美好的人"的文学，才能带给我们积极的影响，才值得我们效法："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龙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他说得对，文学的确应该描

绘“美好的人”，因为，主要是通过这样的人，我们理解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看到了应该追求的生活理想。一位美国哲学家说，“宁与柏拉图同悲，不与槽猪同乐”。他简洁而深刻地说明了“美好的人”对于我们的意义：与柏拉图一同体验人生的悲苦，是令人骄傲的，因为那悲苦里有着人性的高贵；像猪一样享受冻馁无虞的快乐，是令人害羞的，因为那快乐里缺乏最起码的尊严。前者肯定人的价值，后者否定人的价值，——而文学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一种迫切的精神需要，其缘故就在于，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表现着对人生肯定的态度，充满了对生活美好的祈向。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作诗为人有不可不辨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文学批评，归根结底，也无非是个论是非、辨然否、别善恶、分美丑的工作，或者，一言以蔽之，无非是个求“缘故”的事业。写作有什么目的？文学有什么用处？什么样的作家才是优秀的、值得尊敬的？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完美的、值得欣赏的？这些问题因人而异，千差万别，似乎无须深究细问的。然而，如果我们要想深刻地理解文学，要想准确地评价作家和作品，就无法对它避而不谈，就必须认真地面对和回答。

关于文艺的目的和功用，长期以来，至少有两种阐释尖锐对立，相互摩荡。“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的回答是：艺术是纯粹的、无目的的，尤其没有道德目的，因为，它不过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审美感受的“表现”而已。与之不同，“为人生而艺术”的功利主义者的回答是：一切艺术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都是与人生关联在一起的，因此，一切艺术都是为了生活、为了人生的，总是包含着对善恶的态度和对是非的判断。

在我看来，不管有多少理由，都不能把“艺术”与“人生”对立起来，不能把文学与道德和伦理割裂开来。视艺术为艺术，强调美感的意义和价值，固然没有错，但是，只有同时把人生当做艺术应该表现的重要内容，只有同时强调道德的意义和伦理的价值，我们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文学。事实上，文学的价值，既决定于它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什么样的完美程度，也决定于它在道德诗意和伦理境界的追求上，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而在一个文化脱序的消费主义时代，强调后一点，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鲁道夫·奥伊肯在诺贝尔受奖致辞中说：“尊敬自己及其作为的艺术家不会非难伦理性。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艺术家几乎很少有人信奉对人生采取的纯美学见解。”以赛亚·伯林也在《艺术的责任：一份俄国的遗产》中说：“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术不是新闻，不是道德说教。但并不是说因为它是艺术，它或者艺术家就不负道德责任。”所以，几乎所有那些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特征，那就是，都把对读者产生积极的人格影响和道德影响，当做自己写作的重要责任和根本目标。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在我们这里，“纯文学”成了许多人的文学“信条”。他们把道德和伦理向度的要求，当做对文学的贬低，把政治性的诉求，当做对文学的亵渎。最终的后果，正像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所批评的那种人一样，我们时代的一些作家对生活抱着一种“绝望”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有时甚至堕落为腐蚀性极强的恶毒和残酷。事实上，他们拒不承认有可能改善人的本性以及社会，拒不承认有可能发现人的内在价值或者对生活产生一种普遍的热爱”。这样，在写作实践上，有的作家便放弃了起码的“道德责任”，任性妄为，肆无忌惮，极力渲染阴暗、病态的情节事象，彻底沦为秽心污目的“消极写作”的奴隶，成为“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的牺牲品。

在我的批评话语中，伦理尺度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有人说这是受了业已过时的“苏俄文学”的影响，有朋友则批评我是着了“左翼传统和儒家诗教”的道儿。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没有说错，没有冤枉我，因为，对俄罗斯的强调道德诗意和精神拯救的“文学纲领”，对中国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和“兴观群怨”的文学精神，我的确是向风慕义并积极评价的。其实，公平地说，我之强调文学和批评的“文化”责任和“道德”意识，也是受英国的德莱登、约翰逊博士、马修·阿诺德和F·R·利维斯启发和影响的结果。我把《悲剧批评的基础》、《〈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和《伟大的传统》当做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经典文本。德莱登说：“使观众在愉快中得到教益是一切诗歌的总目标。”约翰逊博士则说：“写作的目的在给人以教导；诗歌的目的在通过快感给人以教导。”后者的另外两句名言是：“人只要用理性来思考，就会思考道德问题”；“一个作家永远有责任使世界变得更好，而正义和美德并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这些从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延续而来的思想，鼓励了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使他们有信心将“文化”和“道德”当做自己批评事业的稳定基础。

当然，我也必须怀着感激的心情，坦率地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

俄罗斯文学的价值观和精神气质，对我有着更为内在、更为巨大的影响。假如没有俄罗斯文学，很难想象我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会是什么样子，也很难想象我的文学经验会有多么严重的残缺。同情小人物，热爱大自然，利他的献身精神，温柔的博爱情怀，充分的人民性，稳定的信仰基础，对抗罪恶的勇气，拯救苦难的激情，凡此种种，使俄罗斯文学体现出一种高贵的气质和伟大的精神。面对这样的文学，我似乎没有理由不对它充满由衷的敬意，也没有理由不将它所提供的经验，当做自己理解文学的可靠依据。

从批评方法上看，我沾渥英、美现代文学理论惠利的地方，也很是不少。T·S·艾略特和“新批评”派的批评观和“细读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修辞理论，都给我提供了观察文学、评价作品、分析作家的重要启示。尤其是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正本清源地救正了从十九世纪以来形成的种种“客观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文学偏见，雄辩而深刻地阐明了这样一个真理：通过“说服”从“道德”上影响读者，乃是修辞的“缘故”和“目标”。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弥合了“美学”与“伦理”之间自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巨大裂痕。

从内容构成上看，收在本书第一部分的，是谈论外国文学的文章，而其中大部分，都与俄罗斯文学有关，另外一部分涉及的是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的“问题”，然而，无论礼赞俄罗斯文学，还是批评“问题文学”，我的总体的目的无非是发掘那些宝贵的文学经验，以求得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中所说的“上层知识”（按照波兰尼的界定，它是大作家、英雄和圣贤所说所做的总和），因为，在波兰尼看来，正是这些“知识”构成了我们应该“服从”的“标准”。第二部分的话题围绕批评展开，通过这一组文章，我想分析和揭示那些被种种假象遮蔽的问题，内中虽然多有拙直、迂阔之论，但也可以见出我对当代批评的困惑和思考、焦虑和希望。第三部分关涉的，大都是当下的作家和作品现象（除了关于《金瓶梅》和《色戒》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其实包含着共同的意图和指向，即试图通过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分析和研究，来揭示健全的写作应该具有的态度和立场，应该选择的路向和尺度。

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面对的是一个正在生成的不

稳定、不明晰的对象世界。如果说，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面对的是过去时态的文本和事件，面对的大多是盖棺论定的古人或归于泥土的逝者，那么，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则必须与当下正在展开的“对象世界”相周旋，——不仅要克服“媒体”和“市场”的干扰，而且必须与“活生生”的人进行直接的对话，甚至发生直接的冲突。这固然带给研究者和批评家身临其境的在场感和新鲜感，但是，也意味着考验和风险。所谓考验，就是你在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时候，是否能把“说真话”放在“看情面”之上；所谓风险，就是你会因为说真话而失去朋友，甚至招怨树敌。不过，只要能把文学当做神圣的事业，当做我们“共同的朋友”，那么，一切的误解都会烟消云散，一切的敌意都会被升华为美好的友谊。

正像创作是有缘故的一样，批评也是有缘故的。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批评是人类心灵路程上的指路牌。批评沿路种植了树篱，点燃了火把。批评披荆斩棘，开辟新路。因为，正是批评撼动了山岳——撼动了信仰权威的山岳，偏见的山岳，毫无思想的权力的山岳，死气沉沉的传统的山岳。”他将批评的性质和使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批评意味着道路和光明，意味着改变生活的巨大力量；真正的批评应该充满热情和责任感，应该充满担当的精神和行动的勇气。

《论语》上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尽管向上的攀登，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为了文学理想的缘故，为了理想生活的缘故，追求勃兰兑斯所称道的那种批评境界，一定是值得的，也一定是快乐的。

2009年2月26日，北京

目　录

文学的缘故（自序）……1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作诗为人有不可不辨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归根结底，也无非是个论是非、辨然否、别善恶、分美丑的工作，或者，一言以蔽之，无非是个求"缘故"的事业。写作有什么目的？文学有什么用处？什么样的作家才是优秀的、值得尊敬的？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完美的、值得欣赏的？

真正的大师……1

真正的大师，就是温柔的安慰者，他安慰那些痛苦、悲伤的人；真正的大师，就是强大的支持者，他支持那些疲惫、无力的人。他是社会的良心，通过对生活警觉的观察，通过对问题冷静的思考，通过与邪恶的对抗，向人们提供可靠的信息、正直的判断和捍卫正义的勇气。

经典的律则……10

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伟大的经典，也有两个尺度：一个是专业尺度，一个是伦理尺度；用专业尺度来衡量，经典作品必须是自铸伟词、形式完美的，用伦理尺度来衡量，它又必须表现着温柔敦厚的仁爱情怀。

文学上的唯美主义与功利主义……22

我们应该将两者的对立和冲突维持在一个均衡的状态，在两者之间确立一种积极的关联：用"唯美主义"矫正极端的"功利主义"，同时用"功利主义"来修正片面的"唯美主义"。

祝福感与小说的伦理境界……33

充满爱意的道德力量，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是将人从动物的野蛮状态提升出来的“肯定指向”。虽然，就外在的生物性来讲，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但是，就内在的精神性来讲，人之高于禽兽者无量。

站在恺撒的对立面

——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精神传统……44

如果说英国文学更多地表现了对虚荣、贪婪、残忍、忌妒等人类缺点的讽刺的才能，法国文学更多地表现了心灵的浪漫激情，德国文学表现了理性沉思的倾向，那么，俄国文学则更加完美而强烈地体现了人类追求真理、光明与美好生活的理想境界和道德诗意。

俄罗斯经验：文化教养与反对庸俗……55

庸俗不仅是生活之敌，而且是文学之敌。庸俗与文学的伦理精神格格不入，与一切美好的事物格格不入。如果说，教养是人类摆脱庸俗之后所获得的一种精神品质，那么，文学只有在更高的境界上超越庸俗，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才能成为对人类的内心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文学。

忏悔伦理与精神复活

——论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62

对于过去的事情，中国正统文化的态度是：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一言以蔽之，“往前看”是也。然而，忏悔所要求的伦理态度反乎是，即一定要“往后看”，一定不能轻饶“过去”，一定要让罪恶和苦难定格在记忆中。

文学与政治的窗门……75

人们的安全感、自由感、幸福感，都受到政治极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好的政治保障你的基本权利，坏的政治则限制甚至剥夺你的基本自由；好的政治给你安全感，坏的政治则让你活在压抑甚至恐惧中；好的政治给你希望，坏的政治则让你绝望。

文学之病与超越之路……85

精神健康、人格健康的作家是指那些无论在人格上，还是在思想上，无论在热情上，还是在才华上，都达到极高境界，甚至站在时代精神的峰巅的人。

托尔斯泰难题……94

面对暴力问题，人类也许需要一种二元主义的态度，尤其需要那种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这种否定性的态度将善当做最高的价值，当做最高的目的。它将善向上提高到宗教的高度，赋予它一种绝对的不容否定的性质。在托尔斯泰看来，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艺术活动中，善都具有核心的和根本的意义；它高于美，也高于真。

美好人物及其伦理意义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103

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黑暗、混乱的世界发现和塑造美好人物。在他的伟大的作品里，经过漫长而艰难的精神炼狱，罪恶得到了惩罚，良心获得了安宁，精神得到了升华，拯救之舟终于将陷入苦难境地的不幸者送达彼岸。

契诃夫：一只低掠水面的海鸥……113

一只低掠水面的海鸥，一只依偎在岸边的海鸥，这是对作家的契诃夫至为恰当的比喻。它谦逊而温柔地飞翔着，鸣叫着，时而飞向大海，时而飞回大地；它热爱大海，但也依恋大地，因此，既回应着大海的召唤，也安慰着大地的寂寞。它给人们带来大海的问候，也向人们传递着大地的讯息。

朴素而完美的叙事经验

——全面理解契诃夫……123

他的伟大具有亲切、家常的性质，具有亲人一般温暖、朴素的气质。在契诃夫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东西。相反，你感受到的，永远是诚恳而谦虚的态度，是忧郁而善良的情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高尔基为什么贬低果戈理……137

就其天性来说，高尔基是一只勇敢而无畏的“海燕”，喜欢在风狂雨骤的大海上自由翱翔，渴望“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而大多数俄罗斯古典作家，则是屋檐下的鸽子，是丛林里的夜鹰，是雨后啁啾的麻雀。他们的心性显得温良甚至懦弱，除了像鸽子一样传递福音，更多的时候，却是像夜鹰和麻雀一样，吟唱着自己忧伤的希望和卑微的梦想。

傲慢与黑暗的写作

——评《尤利西斯》……150

正文加注释，一百多万字，读来竟比读十部《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还要累人。如果单是疲劳，也算不得什么，问题是，你费时劳力读完了，收获的却是沮丧而懊恼的坏心情。

为什么是库切……159

《耻》似乎并不属于“富有理想”的作品。库切不仅像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所说的那样是个“追根究底的怀疑者”，而且，还是一个认为是非对错的分野“毫无意义”的相对主义哲学的信奉者。

论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170

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身上，通常都有一种由浪漫主义情调和理想主义精神构成的唐吉诃德气质。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意味着对文学的一往情深的爱，意味着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和价值而表现出来的勇敢而执着的精神。为了说出自己的感受和判断，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些真正的批评家的内心充满了难以遏抑的激情和冲动，很少考虑直言不讳的坦率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利的后果。

文学批评：求真，还是“为善”……186

比较起来，“求真”的文化通常指向事，“为善”的文化通常指向人；指

向事则以事定然否，指向人则以人论是非；指向事则论迹不论心，指向人则舍事而诛意；“求真”的“批评型文化”具有鼓励思考、保障自由的积极倾向，而“为善”的“人情型文化”则具有束缚思想、限制自由的消极倾向。

文学批评的绝对命令……191

一个是追求“事实感”，一个是力求“公正无私”，这就是文学批评必须服从的两个绝对命令。尽管这两个律令各有侧重，但是，极其会归，皆期于求得真理与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这两个要求，看似寻常，但要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

猪舌检察者与批评豁免权……195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一个靠写作立身的人，真的“在批评面前”获得了“豁免权”，那么，容我不客气地说，他在文学上的没落大概也就为期不远了。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重要”的人，但却很难再说他是一个“文学”的人。

小街上的面包店……200

四个法国人在一起夸自己的面包店。第一个说自己的是巴黎最好的，第二个说自己的是法国最好的，第三个说自己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那第四个，却平静地说：我的面包店是我们这条街上最好的。

文学主于正气说……205

从根本上讲，一个人如果缺乏正气，缺乏基本的正义感，他就不能很好地感知世界，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人，因而，也就不能使自己的写作达到理想的境界，具有伟大的性质。

我看文学奖……217

一个作家必须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写作上，而不是放在“跑奖”上。为了获奖而低首下心地见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尴不尬的话，送些不干不净的礼，徒徒伤损了自己的颜面，败坏了自家的清誉，何苦来呢？

水犹如此，人该如何？……224

在一个价值失序、文化拔根的时代，人们倒是很容易做“传统文化”的卫道者，很容易变成“死人”的奴隶，从而陷入马克思批评过的“死人拖住活人”的停滞状态。

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230

只有那些关心人生的根本问题、而且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作家，才是优秀的作家；只有那些充满爱意和祝福感的作品，才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大放光芒”。

《红楼梦》的孩子

——论《百合花》的谱系、技巧与主题……240

茹志鹃用古典的精神叙述了一个现代的故事，用现代的故事确证了爱的永恒的精义。《百合花》既是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是对逝去的温暖岁月的追忆，也是对《红楼梦》的一次遥远的回应，是对这部伟大小说的一个庄严的致敬。

模仿、独创及其他

——为《百合花》辩护……256

如果将它用到法律上，必然会像“文革”那样搞得民不堪其苦，冤狱遍于国中；用之于文学批评，则必然要把心灵的温柔而精微的事业，降低为僵硬教条、冷酷无情的“宗教裁判”。这是因为，“大胆假设”在本质上更接近“文化大革命”的有罪推定，而不是现代法律的无罪推定。

庸碌鄙俗的下山路

——《色·戒》及张爱玲批判……268

半个世纪之后，沉滓泛起，旧梦重温，李安把张爱玲隐没在文字背后的一切，夸张放大，转化为疯狂的色情场面，转化为刺激性的视觉狂欢，——电影《色·戒》在“平凡的、庸碌鄙俗的下山路”上，比张爱玲走得更远，影响也更大，因而，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质疑。

消极伦理与色情叙事

——从小说伦理看《金瓶梅》及其评论……282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哪部小说像《金瓶梅》这样，既让人欣赏，又让人厌恶；既让人惊叹，又让人惋惜。它无疑是一部天才的小说，但却很难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自传与怀念的道理……302

文学并不总是外部世界的直接投影，作家也不是时代风气的束手无策的奴隶。人世间没有一个如此美好的所在，在那里，诗人可以无忧无虑地吟唱，作家可以毫无阻难地写作。真正的文学永远出自与现实摩荡冲突的高贵而不屈、纯洁而温柔的心灵。

《王蒙自传》：不应该这样写……312

如果说，面对他人，传记写作需要一种与人为善的仁慈和热情，那么，面对历史和现实，则需要一种冷静而清醒的反思精神，需要一种批判性的言说精神，因为只有这样，作者才能“成一家之言”，才能为读者认识人生和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判断，从而像太史公司马迁那样：“述往事，思来者”。

文学因此而伟大（代后记）……318

对那些被市场绑架、被欲望劫持、被时尚裹挟的作家来讲，司马迁和俄罗斯文学意味着方向和出路。只有像太史公和俄罗斯大师那样勇敢地生活，那样无畏地写作，我们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才有可能使自己时代的文学显得高贵而伟大。

真正的大师

最近，我的一位朋友，从遥远的西北打电话来，说他刚刚读完某“著名作家”的“自传”。他说，自己是很喜欢这位作家的，但没有想到他写起“自传”来会如此自恋，竟然用了那么多的篇幅，顾盼自雄地自我欣赏。然而，更令他难过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当谈到一个已经客死他乡的颇孚众望的老作家时，这位“著名作家”却大加贬抑，几近诟厉，全然不念往日情分，不仅毫无“费厄泼赖”的精神，而且缺乏最起码的“宽容”和物伤其类的“同情”。随后，又说到另外一位作家如何以字画为诱饵，到西部某国家级贫困县大敛其财，对此，我的朋友更是痛心疾首：“那地方穷得丁零咣啷响，有好多孩子失学呢。他一下子卷走那么多钱，于心何忍！”最后，我的这位朋友，失望而困惑地说：“这样的作家怎么可能写出好作品？——你说，咱这里，咋尽出这么一些作家？咋就出不了几个真正的大师呢？”

真正的大师？这倒是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一个时代若是正常，就应该充满期待大师出现的强烈愿望。因为，大师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在文化创造上所达到的高度，而且，还会对一个国家的文明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雨果说过这样一段话：“试将莎士比亚从英国取走，请看这个国家的光辉一下子就会削弱多少！莎士比亚使英国的容貌变美。他减少了英国与野蛮国家的相似点。”[①]是的，有了但丁，意大利就显得灿烂辉煌，失去了莎士比亚，英国就将黯然失色；有了贝多芬，德国就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失去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俄罗斯就会失去至少三分之一的光荣。如果说，经济上的富有和军事上的优势，显示着一个国家外在的强大，那么，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上的辉煌，则在更高的意义上表征着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健康和伟大。倘若在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你看不到精美的雕塑，读不到优美的诗歌，听不到华美的音乐，那么，这个国家本质上就依然是贫穷的，就是不值得

① 维克多·雨果：《威廉·莎士比亚》，丁世忠译，第252页，团结出版社，2001年。

羡慕和赞美的。唐代较长时期的政治清明，固然是了不起的业绩，但它真正令人向往的，却是由诗人创造出来的那个四季常春的美丽世界，换句话说，最终使唐朝不朽的，是伟大诗人们的吟唱，而不仅仅是帝王们的文治武功。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在政治上几乎是无足称道的，但是文学上的成就拯救了它，——一个出现了群星一样灿烂的文学大师的时代，人们不仅忽略它政治上的落后，而且感激它在文化上的贡献。

因此，一个社会若是足够强大，就应该为大师的产生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它就应该在人们身上培养健全的人格、丰富的情感和创造的精神。自由精神应该被当做人的基本天性受到保护，批判精神应该被当做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受到包容，博爱精神应该被当做公民的基本情感受到培养，平等意识应该被当做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出现大师；即使如此，也未必一定能够出现大师。因为，大师的出现，还有赖于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条件甚至神秘的因素。

那么，何谓大师？大师是那种在创造能力和人格修养上，都达到极高境界的人；是那种在许多方面，都高于他的时代的人；是那种人们提到他的名字，便觉得温暖和鼓舞的人，便觉得骄傲和自豪的人。他还有其他几个别名："天才"、"英雄"、"伟人"。比较起来，"天才"显得超凡卓异，是康德、叔本华等哲学家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钟爱的表达；"英雄"充满内在的力量，是卡莱尔著作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巨人"则强调着精神和人格的伟大，是罗曼·罗兰的几部传记着力描述的形象。最近十多年，"大师"似乎取代了"天才"、"英雄"和"伟人"，频繁地见诸媒体和"评论文章"，被用来评价那些在名利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三流作家。这也不奇怪，——越是没有大师的时代，越是会用虚假的方式制造大师。在一个广告话语主宰一切的消费主义时代，华而不实、言过其实的夸饰，就成为一种流行的表达风格和修辞策略。"大师"遂因为被当做广告语言随意滥用，而失去了它固有的庄严和神圣的光彩，而沦为一个贬值的名词和廉价的称谓。因此，为了我们的文学能有可靠的前行方向和稳定的评价尺度，我们必须捍卫"大师"的严肃性，必须恢复对"大师"的虔诚和敬意。

是的，大师不是那种和光同尘的俗物，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小市民。真正的大师是在才华和人格上同时达到极高境界的人，换句话说，他既是一个思想深刻的智者，又是一个民胞物与的仁者。他有愿望也有能力为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